

闻一多《楚辞》研究的基本层面

袁 蓀 正

闻一多先生是著名诗人,学者和民主运动战士。作为学者,他在《楚辞》方面辛勤耕耘,历时最长,收获最大。一九三一年左右,他开始研究《楚辞》。十年以后,他这样谈到《楚辞》难读的原因及其所确定的三项研究课题:

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,大概不出三种原因。(一)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,史料不足,难于了解;(二)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,尤其那些“约定俗成”的白字,(训诂家所谓“假借字”)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;(三)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,往往也误人不浅。《楚辞》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,所以在研究它时,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,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:(一)说明背景,(二)诠释词义,(三)校正文字。①

从他的有关论著看,他研究《楚辞》的课题,并不限于这三项②。为了方便和节省篇幅,本文仅就闻先生“校正文字”、“诠释词义”这两项课题,即《楚辞》研究的基本层面,试作一个粗略的考察。

人们认识这两项课题,很容易产生偏颇。一些训诂家、校勘家过分夸大它的意义,往往只是在这个层面“盘旋”③,视之为《楚辞》研究的终端和目的,似乎除此则无更深层面的研究。这是自汉至清的《楚辞》研究不能产生巨大超越的一个重大原因。另一种偏颇是注重“说明背景”,却轻视文字校勘和诠释词义,似乎《楚辞》的深层研究与此关系不大。某些论者的纰漏和谬误即往往由是而生。闻先生

认为,“说明背景”属于深层研究,“校正文字”是“最下层”、“最基本的研究”,而“诠释词义”则是“说明背景”的基础。他在《怎样读九歌》一文中说:“钻求文义以打通困难,是欣赏文艺必需的过程。但既是过程,便不可停留得过长,更不用提把它权当了归宿。”既然欣赏文艺如此,研究文艺就更不待言了。可见,他在重视深层研究的同时,并不轻视校注这一基本层面的研究。他是把这两项课题当作《楚辞》研究的基础和必经阶段来对待的。以“校正文字”而论,这项“最下层”的课题的必要性即显而易见。因为,《楚辞》到汉成帝刘向时恐怕已有异文错简现象。刘师培《楚辞考异》更说:“汉人所引,文已互乖,六朝而降,异本滋众,故群籍引称,文多歧出,即书出一人之手,后先援引,迥复互殊。”这是合乎事实的。现在所能见到的传本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及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,也只是明儒宋本,其底本已不复存在。尽管自宋以来众多学者作过校勘,但应当补苴诂正者甚夥,以致给读者造成许多困难。正因为如此,闻先生“校正文字”的工作才有意义。他对《楚辞》的深层研究,就是在“校正文字”和“诠释词义”的基础上进行的。

闻先生校注《楚辞》的成果,已收入一九四八年版《闻一多全集》的,有《离骚解诂》、《天问释天》、《楚辞校补》、《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(附校勘记)》和《怎样读九歌》;未收入《全集》的,有《离骚解诂》(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④、《天问疏证》(八〇年三联书

店出版)、《九歌解诂·九章解诂》(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,还有一些未刊手稿⑤。这些校注《楚辞》的著作,无论是异字异文的裁断,衍文错简的确认,还是字词文义的诠释,都能正讹祛惑,发疑解滞。这对开创《楚辞》研究的新局面,将传统方法与近现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,有重要作用。他的许多发现和考证,时至今日,仍然反响不息,这在学术界是并不多见的现象。

实事求是,是闻先生校勘、注释《楚辞》的基本态度。他受过“五四”运动的洗礼,又曾广泛接触过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,但对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并不一概摒弃。相反,他深受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,对历代学者研究《楚辞》的成果,抱审慎态度,从不作轻率武断的否定,凡是能“拿来”为已所用的,都尽量加以吸收。其《楚辞校补》除引用王逸、洪兴祖、刘师培、许维遹、刘永济诸家旧校材料和采用古今二十八家涉及校正文字的成说外,还有作者自己从六十五种书籍中搜集到的可资校勘的材料,是一部以“校正文字”为主而又溶入“诠释词义”的名著。只要我们对“今本误,可据别本以堤正之者”、“今本似误而不误,当举证说明者”、“今本用借字,别本用正字,可据别本发明今本之义者”、“各本皆误,而以文义、语法、韵律诸端推之,可暂改正以待实证者”、“今本之误,已经诸家揭出,而论证未详,尚可补充证例者”等各项内容略作考察,就不难了解他是怎样实事求是,重视和吸收他人成果的。

为了说明问题,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。

在“校正文字”方面,如《离骚》有“固时俗之工巧兮”,《楚辞校补》说:“刘永济氏云:固疑何之误。此句两见《九辩》中,皆作何。何有疑怪意,作固,则肯定矣。案刘说近是。”又进一步指出:“何固形近而误。然《七谏·谬谏》曰‘固时俗之工巧兮,灭规矩而改错’,袭《骚》文而字亦作固,则东方朔所见本已误。”看法就比较客观、正确。又如《离骚》“曰黄昏以为期兮,羌中道而改路”,洪兴祖

曰:“一本有此二句,王逸无注,至下文‘羌内怒己以量人’,始释羌义。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。”屈复更说:“此二句与下‘悔遁有他’意重,又通篇皆四句,此多二句,明系衍文。”闻先生同意洪、屈之说,复以“本篇叶韵,通以二进,此处武怒舍故路五字相叶,独为奇数,于例不合”,证二句确系衍文。如此言之凿凿,更成定论。至于注释,闻先生总结前人成果之处也很多。《天问疏证》将《天问》原文析为九十五行疏证,有选择地采用了王逸等人旧说,并借鉴了杨万里、周拱辰、毛奇龄、屈复、丁晏等人的注疏材料。如“曰遂古之初”四句,他依例录王逸原注,自己不再出注。这就是他沿用王逸旧说的一种形式。四句文义显豁,而王注亦不误。可见闻采成说,恰到好处。又如“鲧何所营”四句,王逸注云:“言鲧治鸿水,何所营度?禹何所成就乎?康回,共工名也。《淮南子》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,不得,怒而触不周之山,天维绝,地柱折,故东南倾也。”解说合理。故闻云:“案王说是也。”并作了必要的考释,一则在征引《淮南子》的《天文篇》和《原道篇》有关文字之后云:“此王说之所本。”复录黄文焕说,称其“善得问指”,进而揭示:“盖四句之意,谓世言治水者,咸归功于禹,不知禹之谋猷皆承鲧之旧,而先乎鲧者康回触山之功尤不可没也。”于是,《天问》原文应有之义更为显豁而合理。象这样总结前人成果的校注,实例是极多的,这里不拟一一论及。

从王逸到现代的《楚辞》研究成果,总有若干合理成分。如果对它们一概抹煞,是不足取的。至于那些流传既久,“事出有因”的旧说,虽或有所怀疑,而又一时无法提出充足的反证,与其匆匆否定,不如暂时承认。这才是比较审慎的态度。闻先生论《九章》真伪时即有这种看法。他说,《惜诵》、《涉江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抽思》、《怀沙》五篇,“虽无法证明其必为屈子所作,然亦无法证明其必非屈子所作”,“凡古代相传之事实,在无人提出反证,或所提之反证并不充足时,吾人只得暂时承

认传说为不误，或至少‘事出有因’。对于五篇之《九章》，吾人今即本此态度，而承认其为屈原所作”^⑥。由此可见，他校注《楚辞》不轻率否定前人成果，是和他这种贯穿在学术研究中的求实精神联系在一起的。

敢于创新和开拓，是闻先生治学的最显著的特点。他校注《楚辞》这一层面，亦复如此。早在四十多年前，有人在他的“非常异义，可怪之论”面前深感惶惑。这种情况，固然与株守成说的习惯有关，但对他的“非常异义，可怪之论”缺乏真正了解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这些人似乎只惊异于他的结论，而不曾认真考察他的结论是否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。无疑，在学术研究上全凭臆测，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标新立异，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但迷信成说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却不会有所发现和创造。闻先生校注《楚辞》，避免了这两种倾向。他的“非常异义，可怪之论”，乃是追求真理的表现，充满创新和开拓精神。

闻先生在校注《楚辞》这一层面上的标新立异，大致可分两类。一类实际比较持平。例如《离骚》“曰鮀婞直以亡身兮”之“亡”，王逸注如字读之。但此句言鮀已“亡身”，下句则不当复言鮀“妖死”，故吴汝纶据五臣本及旧注，以为“亡”当系“方”之讹。闻先生受王闿运启发，其《楚辞校补》亦以王注非是，但据五百家注《韩昌黎集》之《永贞行》祝注引“亡”作“忘”及古字“亡”、“忘”互通之理，认为“亡身即忘身，言鮀婞直，不顾己身之安危也”。又“然终妖乎羽之野”，王逸注训“妖”为早死。闻谓“鮀非短折，焉得称妖？妖当从一本作夭。夭之为言夭遏也”。并引《淮南子·俶真篇》双声连语“夭遏”二字同义，证“夭乎羽之野”犹《天问》曰“永遏在羽山”。又如《天问》：“舜服厥弟，终然为害。何肆犬体，而厥身不危败？”此问自来不得其解，闻先生《楚辞校补》据王逸注“言象无道，肆其犬豕之心”，以为“体”系“豕”之误；又训“肆”为“溃”，注也。则“何溃犬豕”就是《列女传·有

虞二妃传》的“药浴注豕(矢)”之俗。象这类不同旧说的校注，极富创造性，而又持论平实，实际上是很容易使人接受的。即如别树新解，以四句为一单元诠释《天问》，与自王逸以来诸家以二句为一单元作注大相径庭，也因能解决许多“问意终不能通”之弊，为许多学者所重视。

与此不同，另一类校注就新奇得惊世骇俗了。例如《离骚》“孰迷情而慕之”与“命灵氛为余占之”不叶韵，义亦扞格难通。郭沫若以为“慕”字当系传写过程中合“莫□”二字为一字之误。闻然其说，“尝准兹三事（指形、音、义）以遍求诸与‘占’同韵之侵部诸字中”，云“惟‘念’足以当之”，“念，思也，恋也，‘孰信情而莫念之’，与上下文义亦正相符契”（《楚辞校补》）。“占”、“慕”失韵，朱熹以二“之”字为韵解之，殊不可信。逮至近人，颇多推测，然皆失之。闻立此新说，诚属胜义，为各家所不及。至如《九歌·湘君》“美要眇兮宜情”，闻氏校注更是奇特。他以为“情”当为“笑”字之误。致误之由，系受下文韵脚之同化而为后人所改。而《楚辞》屡言，“宜笑”，如“既含睇兮又宜笑”（《山鬼》），“嚙醜奇牙，宜笑嫣只”（《大招》），“嫫目宜笑，娥眉曼只”（《大招》）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亦有“宜笑”之语。认为诸“宜”字并读为“醜”。又据《字镜》“醜，嚙也”，《集韵》“嚙，醜病”，及《后汉书·梁统传》载冀妻孙寿“善为妖态，作醜齿笑以为媚惑”，说“醜笑犹醜齿笑矣”。并且认为，“诸家虽未必读宜为醜，然皆以齿见状笑貌，则与《集韵》训嚙醜为齿露貌暗合”，而“古人形容美貌，独重视笑，故每以目与口齿并言”，如《诗·硕人》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之类，“不胜枚举”；“要眇宜笑，亦目与口齿并举之例”。如此大胆立论，而又考据翔实，是很有启发性的。姜亮夫先生曾据《山鬼》“含睇宜笑”王注“人好口齿而宜笑也”，亦疑“宜情”为“宜笑”之讹，却未将“宜”训为“醜”，如以闻说为准，可谓失之眉睫^⑦。肖兵先生受闻说启发，训“宜”为“醜”，更将“奇牙”与“宜笑”联系起

来,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,虽然还难说就是定论,但充分显示了闻先生这一研究方向的活力^⑥。足见标新立异、惊世骇俗的研究,只要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富有启发性和开拓精神,是不能视为怪诞之论的。这种情形,如同他以“鱼”、“打鱼”、“烹鱼”为“匹偶”、“求偶”、“合欢”的隐语^⑦,及以伏羲为苗族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之类那样^⑧。即使令人瞠惑不止,但细心追寻,也会感到很有道理,难于辩驳。他在《楚辞》研究方面的巨大反响,主要是由这种具有创造性和科学性的标新立异激起的。随着观念的不断更新,思维空间的逐渐拓展,他的包括校注这一层面在内的《楚辞》研究成果,已越来越为人们理解和接受。

无疑,不株守成说,追求富有创造性和科学性的标新立异,是学术发展的动因和契机。这种境界的标新立异,首先要求大量占有材料,而不能凭孤证,或专恃胸臆以为断。从上面提到的一些校注实例看,闻先生的创获多以充足的材料作支撑。《九歌·大司命》有“灵衣兮被被”之句,《楚辞校补》以为“灵”当为“云”字之误。证据焉在?他列举了一系列的材料:“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‘云都’,《春秋·世族谱》作‘灵都’。《后汉书·顺帝纪》‘登云台’,《章帝纪》作‘灵台’。《管子·内业篇》‘是谓云气,意行似天’,丁士涵云,云当为灵。《海内北经》‘冰夷人而乘两龙’,注‘画四面,各乘灵车,驾二龙’,《御览》六一引作云车。”当然,仅有大量旁证还不能证实“灵衣”即“云衣”之误。于是,复又求诸《楚辞》,罗列《九思·悯上》“灵泽”一作“云泽”、《九歌·东君》亦有“云衣”、《九叹·远逝》“服云衣之披披”全袭此文等内证。这样,“灵衣”为“云衣”之误的见解就不可动摇了。又同书断“伯禹腹鲧”当为“伯鲧腹(孚)禹”、举三证考“凤皇”即“玄鸟”等,都立论大胆而又材料翔实,是使人激赏的典型。

阙疑与纠正失误,是闻先生校注严谨的表现。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,他的标新立异

与科学性有着紧密的联系。他校注《楚辞》,知之谓知之,不知谓不知,对某些误错简和事义难明之处,一般不强加订正和解释,与其言之无据,毋宁付之阙如。《思美人》有“固朕形之不服兮”,其《九章解诂》云:“服字疑误,未详所当作。”《天问》有“何所冬暖?何所夏寒?焉有石林?何兽能言?”其《疏证》既以王逸注兽在林中为是,复“疑冬暖夏寒亦斥石林,岩洞中气候本皆如此也”,继以“四句本事无可考”作结,止于其所当止。《天问》还有“萍号起雨,何以兴之!撰体协肋,鹿何膺之?”《疏证》先谓:“蒋骥谓鹿指风伯飞廉,上问雨师,下问风伯,以类相从。刘永济又读膺为摩,与号对举,说并近理。”继云:“但不知风雨何以不在前天象诸问中而属于此?且以鹿为飞廉,虽有《三辅黄图》说为证(详下),然与‘撰体协肋’之语,仍不合。古神话传说之不见于传记者多矣,此类皆不可强说,阙焉可耳。”这类阙疑,是审慎而科学的。它可以避免主观武断,贻误他人。更可贵的是闻先生有追求真理、纠正失误的精神。他在《天问释天》一文中,曾一反王逸以来各家解说,考“夜光何德,死则又育?厥利维何,而顾菟在腹”的“顾”字不当作“顾望”解释,取证达十一项,证明“顾菟”即是“蟾蜍”的异名。由于实证充足,考据严密,多少年来为学者们所肯定。郭沫若同志就说过,“我敢于相信,他的发现实在是确凿不易的”^⑨。但闻先生后来在他的《天问疏证》里,修正了自己曾付出巨大劳动的结论。他说:“顾疑当读为踞。月中有踞菟,盖犹日中有踞乌。”并引《淮南子·精神篇》、《庄子·外物篇》释文和《说文》,训踞与踞,踞也;释“厥利维何,而顾菟在腹”二句为“谓月何所贪利而使兔居其腹中也”。最后,还推测先秦可能已有月中白兔持药的传说,如果真是这样,那么此问“盖即谓其利在持药欤”?虽亦有待进一步证明,但较之释“顾菟”为“蟾蜍”平实可信。他在释“顾菟”为“蟾蜍”时,曾多方取证,仍叹“要为直接者寡,间接之中又有间接焉”,自己

并不是坚信无疑的。如今有了新发现、新认识,对自己以前的看法加以修正,是必要的。这种情形,和他修正《诗新台湾字说》的观点相类^⑩。如果没有追求真理、实事求是的态度,就不会如此断然推翻自己已有的结论。这一事实说明,即使再正确的观点,也不会就是绝对真理,它往往还留有修正、完善和发展的余地,总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。

正因为如此,闻先生校注《楚辞》的贡献,不但在其成果本身为我们订正了许多讹误,解决了不少疑难,而且还在他的创获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。我们认为,他将传统学问和近现代社会科学结合起来,开拓了《楚辞》研究的思维空间,这比他的成果本身更富有意义。

为古老的《楚辞》“校正文字”和“诠释词义”,不可能离开传统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。在这方面,闻先生根柢极深,造诣甚高。这是他的《楚辞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原因,他的《楚辞校补》、《离骚解诂》、《天问释天》、《天问疏证》、《九歌解诂·九章解诂》等著作,几乎随处都涉及到汉字的形体、声音和意义,以及韵律和通假现象等等。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校勘和注解,就很可能说明问题。如辨“孰信情而慕之”中“慕”与“占”不叶,而断“慕”为“莫念”之讹;辨“美要眇兮宜情”中“宜”为“醺”之通假和“情”为“笑”之声误,而释“宜情”为“犹龋齿笑”,等等。这种传统学问,只要不穿凿附会,注重实证,往往能解决不少疑难,或发前人之所未发。朱自清先生曾这样回忆说:“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孙父子,常将《读书杂志》、《经义述闻》当作消闲的书读着。”^⑪清代朴学大师们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和考据之学,启示他从事扎实而富有创造性的劳动。而其成就,却疑颉颃乎驾于他们之上。因为,他研究《楚辞》的目的和观念、方法,都有着近现代科学的特点。

闻一多先生说,他校注《楚辞》的目的,“是想替爱好文艺而关心于我们自己的文艺遗产的朋友们,在读这部书时解决些困难。”^⑫这个说法看似平淡,却体现了他重视

和热爱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精神,反映了他切实解决读者困难的愿望。这就使他避免了为考据而考据所导致的“释事忘义”的弊端。乾嘉学派的末流,甚至现代的某些学者,他们校注古籍,或无的放矢,动辄万言;或堆垛材料,无真知灼见。如此词费,类似炫博,为世诟病。与此不同,闻先生校注《楚辞》旨在正讹误,祛惑滞,并不无目的地逐字做文章。而对疑难问题的考据,当繁则繁,当简则简,从运用实证到阐明己见,都以解决问题为度,胜义层出不穷。

在《楚辞》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,闻先生在吸收文字、音韵与训诂学的成就的同时,更显示出他对传统的惊人超越。这和近现代新学术思潮的激荡有极大关系。众所周知,以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为代表作家的《楚辞》,有它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、文化背景,加上它自身内涵的丰富性和特殊性,它的研究疆界显得十分广宽。这一事实为与闻先生大致同时或稍前的许多现代学者所注意。他们用新观念、新方法对《楚辞》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。王国维一马当先,考诸才出土不久的甲骨卜辞,证实“该秉季德,厥父是臧”的“该”就是王亥,使《天问》有关殷民族历史传说的真面目得以恢复。这是对王逸以来《楚辞》注家传统观念和方法的一次重大突破,从而开了用现代历史科学和实证方法研究《楚辞》的先河。梁启超更拓展了学术研究的思维空间,从纯文学及其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把握《楚辞》,初步预示出现代《楚辞》综合研究的前景。王、梁以后,许多《楚辞》学者踵事增华,追求新观念、新角度、新方法,几乎蔚成风气。其中,闻先生更以十五六年的努力和成绩推波助澜,他不但吸收了传统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考据学的成就,而且还吸收了近代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文化学、文艺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神话学、宗教学、心理学诸方面的成就,堪称这一领域里自觉尝试采用综合研究并获得可观效果的杰出学者。当然,各种近现代社会科学的

观念和方法,主要表现在他的《楚辞》校注以外的深层研究之中。他的有关评价屈原、探讨《九歌》和考证《楚辞》里的神话传说等系列性论文,会给我们以这种明晰的印象。但是,正如他自己所说,“三项课题本是相互关联的,尤其(一)(指“说明背景”)与(二)(指“诠释词义”), (二)与(三)(指“校正文字”)之间,常常没有明确的界线”^⑤,他在“诠释词义”甚至“校正文字”时,也往往包含着某些近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方法。其中,《天问疏证》多以卜辞和金文作实证。且不说因采王国维以卜辞证“该”即王亥的成果“使《天问》“该秉季德”以下二十四问大体迎刃而解,即如“简狄在台誓何宜?玄鸟致贻女何嘉?”“胡终弊于有扈,牧夫牛羊?”“何往营班禄,不但还来?”“会朝清明,何践吾期?”“昭后成游,南土爰底。”等句个别字词和史实的考释,也都因充分利用甲骨卜辞和金文,刷新了王逸以来诸家的解说。它如同书用近现代民族学、神话学进行考释,认为“女歧”和“九子”。“皆古民族推源论中之神话人物,故或为人名,或为地名,而地名随民族而迁徙,故地又或在南,或在北也”;及认为“鯀何所营!禹何所成?康回冯怒,地何以东南倾?”之说,“最富神话性,当为我国治水传说之最古者。儒书盛而神话微,惟《天问》与《淮南》稍露鳞爪”,等等,都很有生气,使人眼界大开。在这篇短文里,要想仔细考察他的新观念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,是困难的。但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他校注《楚辞》这一基本层面的贡献和意义还没有充分的估计,指出这一事实,似乎是必要的。

闻先生的《楚辞》校勘和诠释,虽然是学术上的重大贡献,但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。我们认为,尚可讨论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:①闻先生注解《楚辞》多所创获,但有些新解大胆有余,实证不足,以致难于使人信服。如“鯀本水族动物之神”,即恐有待进一步证明。②先秦古籍多通假现象,这是事实。但闻先生遇到疑难而求助通假,有时不

免存在迂曲难通之嫌。且不必再说“顾菟”为“蟾蜍”之通假几经周折,终不能自圆其说;即如“怀沙”“浩浩沅湘分(一本作汾)流汨兮”之“汾”读为“溢”^⑥、《悲回风》“证此言之不可聊”之“证”读为“激”之类^⑦,也是比较勉强的。③闻先生对神话的综合研究及其在近现代社会科学上的多方面造诣,尚未更有效地切入《楚辞》校注这一大有可为的层面。这也许是受了传统校注框架的影响,或为了避免与深层研究相重叠的缘故吧。

注释:

①④⑤⑥ 《楚辞校补·引言》,见《闻一多全集》第2卷。

② 闻先生关于《楚辞》的研究课题,除“说明背景”、“诠释词义”、“校正文字”外,还有对作品自身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多维观照,如关于《九歌》的系列性论文,就不是这三项课题所能概括的;而“诠释词义”一项,实际上也往往越出了狭义的疆界,而走向考释。

③⑪ 参见《闻一多全集》郭序。

④ 此书有季镇淮先生写的《后记》,提到了两种《离骚解诂》的关系。

⑤ 主要有《楚辞解诂》、《楚辞校拾》。前者照录洪兴祖《补注》中《楚辞》原文和王逸注,以多种版本和其它材料对二者作校勘,自己不出注,似乎是《楚辞校补》以前的手稿。后者是他从古籍中搜集到的一些可用于校勘的材料。

⑥ 《论九章》,见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1年第1期。

⑦ 参见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(1957年人文版)259页。

⑧ 参见萧兵《属辅奇(畸)牙——〈大招〉新解》,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》34—38页。

⑨⑩ 分别参见《说鱼》、《伏羲考》,《闻一多全集》第1卷。

⑫ 闻先生在《说鱼》一文中说:“我从前把鸿字解释为蜃蜃的异名,虽然也够确凿的,但与《九章篇》的鸿字对照了看,似乎仍以训鸟为妥。”

⑬ 《中国学术的大损失——悼闻一多先生》,见《闻一多纪念文集》。

⑭ 《九章解诂》。